

中国史学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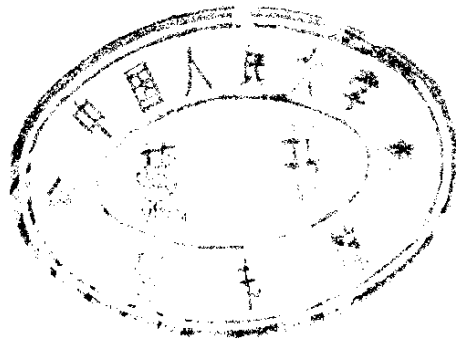
刘 节

中华书局

1055947
11(4)/12

中国史学史稿

刘 节



中国史学史稿

刘 节

责任编辑 庄 昭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河 南 省 经 济 学 会 发 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875印张 318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0 册

统一书号 11219·10 定价1.53元

RD07/10

说 明

《中国史学史稿》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刘节（1901—1977）教授的遗著，也是他在“文化革命”前多年教课的讲稿。初稿写成于1955年，后来又作过多次补充和修改。因原稿经多次油印，文字错漏不少，这次出版前由我们重新整理、校对、统一体例和抄写付排。但因刘节先生已经去世，我们的水平不高，又因时间仓促，故现在书中的文字也难免还有些错漏。恳望史学专家、读者不吝教正，以便将来再版时修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书中有些引文与原著有所出入。其原因是刘节先生过去为了方便同学阅读其文句内容，而有意地把引文作了一些变动或删改。所以，在我们这次校对时，即以刘节先生的原稿为依据，没有再按原著统统地把它改过来。今后读者如引用时，请核对原著为准。二、作者是大家所熟识的一位学有专长的著名史学家。他生前治史从不隐瞒自己的学术思想观点，过去史学界对他的学术思想也曾经有过争论或批评，我们一向也认为他的史学思想是可以评论的。但是，为了保留原著的本来面目，我们对书中的学术观点都没有更改。

刘节先生这本大作不仅史料内容颇为丰富，而且对于这门学科也是一家之言。书中的特色，大致有下述几点：

一、他毕生勤于读书研史，学识渊博，态度谨严，书中广搜史料，博引群书，并且对于材料的鉴别取舍，都很注意它的真实性和针对性。读之便知，无须列举。

二、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考据学、文字学、金石

学、史料学以及思想史和史学史都有研究，书中对于研究历史学、史料学和史学史的对象任务、目的要求和方法态度等各方面，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叙论》中已作了简介。

三、书中的体系，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高涨时期，即如作者在《叙论》中所说：“我过去以朝代分，重点三个：①魏晋南北朝；②两宋；③清代。着眼点在史籍种类和数量的增多，历史考据学的萌芽和发展。”这样写法，固然是作者过去的见解，也是为了发挥其本人之所长。但是他也认为：这样分当然片面性很大。所以后来他也同意现在的一般看法：先秦是一个时期；从司马迁到刘知几为一个时期；从刘知几到《明史》是另一个时期；从乾嘉以后历史考据学大盛，也应该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也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史学界至今也仍未解决。

四、刘节先生一向认为史学家的生活处世态度与其著作总是有直接关系的，书中在评论古代史家及其史著时，他也往往把自己摆在里面。在刘先生看来，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不仅必须兼具才、学、识三长，而且还必须在历史学、考据学和历史哲学方面下功夫，才能作出自己的贡献。如古代的两司马、刘知几、王夫之、章学诚，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现代的郭沫若。他历来都很赞扬他们在史学上各能卓然成家的成就，并且也以他们作为自己的表率。

刘节先生为人耿直，一向讲真话，言行一致，即如他自己常常所说：“我所想的就是我所讲的，我所讲的也就是我所做的。”我们和他相处一、二十年，他的为人的确如此，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曾庆釜、林道南、刘继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于广州

目 录

一、叙论	(1)
二、释史	(10)
甲、语言文字上的解释	(11)
乙、社会制度上的解释	(12)
丙、我的看法	(14)
三、古代史籍的雏形及其蜕变	(15)
甲、殷墟卜辞中的记事方式	(16)
乙、两周彝铭中的记事方式	(17)
丙、《尚书》中的记事方式	(20)
丁、《左传》中的记事方式	(20)
四、古代史官与史学	(25)
甲、古代史官	(25)
乙、古代史职	(32)
丙、古代史籍	(34)
丁、古代史学	(39)
五、两汉史学概观	(43)
甲、史官	(43)
乙、史家	(45)
丙、史籍	(49)
丁、史学	(50)
六、司马迁与班固	(55)
甲、传略	(56)
乙、马班两家史学之比较	(58)
丙、《史》《汉》体例	(63)

丁、后世传习之经过	(65)
七、魏晋南北朝史学概观	(67)
甲、史官与史职	(68)
乙、史家与史籍	(71)
丙、新史料的发现与史籍目录	(99)
八、文学、玄学与史学	(103)
甲、一般史学家的生活态度	(104)
乙、一般史学家的哲学思想	(111)
丙、魏晋南北朝史学家的文学	(119)
丁、断代史的年限问题与国史条例	(123)
九、隋唐五代史学概观	(129)
甲、史官及注记制度	(130)
乙、隋至盛唐所编订的新史	(138)
丙、《通典》与《通历》	(144)
丁、唐代新起的史体	(151)
戊、五代时的史籍	(154)
己、隋唐五代的新史料	(157)
庚、唐代的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哲学	(159)
十、刘知几的史学	(162)
甲、传略	(163)
乙、对于史学上的贡献	(164)
丙、同时学者	(174)
丁、后来影响	(175)
十一、两宋史学概观	(177)
甲、史官制度	(177)
乙、史学与史学家	(185)
丙、新史体与新史书	(196)
丁、新史料之发现	(203)

戊、南宋时代的历史哲学	(205)
十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210)
甲、传略	(210)
乙、《资治通鉴》編集始末	(211)
丙、《通鉴》采用史料之鉴别方法	(217)
丁、《通鉴》史学	(219)
戊、《通鉴》书法	(223)
己、《通鉴》之缺误	(224)
十三、郑樵的史学	(226)
甲、传略	(227)
乙、郑樵在史学上的贡献	(228)
丙、《通志》二十略与《玉海》、《通考》的比较	(237)
十四、宋元以来史籍刊刻的经过	(240)
甲、刻书之始与早期所刻的史书	(241)
乙、宋代刻书的四个地区与所刻的史书	(245)
丙、元明清三代所刻的史书	(248)
丁、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保存宋元以来所刻正 史之大结集	(250)
十五、辽金元明史学概观	(255)
甲、史官制度与实录之修订	(256)
乙、官修诸史的修订经过	(262)
丙、私修诸史的修订经过	(272)
丁、明代的国史与野史	(280)
戊、元《经世大典》与《明会典》	(285)
十六、王夫之的史论	(287)
甲、传略及其著作	(288)
乙、哲学体系	(289)
丙、人类社会发展观	(292)

丁、几个反传统的观点	(295)
戊、历史家的出处与作史的意义	(298)
十七、《明史》修订的经过	(303)
甲、《明实录》及其他史料的片面性	(304)
乙、《明史》修订的三个时期	(306)
丙、现存的《明史》稿本	(311)
丁、《明史》之评论	(315)
戊、清代人所著明代编年史及其他有关明代史著 ..	(320)
己、《明史》与清代的史狱	(323)
十八、清代史学概观	(327)
甲、史官制度	(328)
乙、《清史》修订的经过	(328)
丙、重订旧史各派	(332)
丁、重辑旧史各派	(340)
戊、校注旧史各派	(344)
己、新创的史体与史书	(351)
庚、历史地理学及年历学	(355)
辛、古器物学与古铭志学	(357)
壬、浙东史学及其渊源	(363)
癸、古史学与疑古学派	(369)
十九、章学诚的史学	(377)
甲、传略	(379)
乙、思想体系	(381)
丙、史学理论	(384)
丁、史体沿革与史家批判	(390)
戊、方志学与校讎学	(397)
己、《史籍考》	(402)
编后话	(404)

一、叙 论

历史学在中国，可说是源远流长，包罗万有。刘知几早在唐代已作了一次批判和总结，《史通》一书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著作。宋代郑樵，清代章学诚，又继续做了总结工作，提高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质量。近代也出现了一些新著作，已经带有资本主义时代的气息，与封建时代的著作相比，面目一新。但照现在新史学的眼光去看，不只是陈旧，而且有些讲法是反动的。我们必须彻底改造，日新更新。

我们为什么要讲史学史和史料学呢？历史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总汇，其内容之丰富是无可比拟的。其中包括了各种学术和一切制度、风俗，更不必说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各方面的事情了；还不止于此，历史一名是应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而言的。人类知道写自然史，还是最近一个世纪内的事，而且借助于现代科学的水平，也还不能写得很好。至于写人类自己的历史，就我们中国说来，可以说早得很。至少从春秋以来，各国已经有国史。如《春秋》是鲁史，《竹书纪年》是魏史。各国大体说来都有史官。如果不要把定义下得太狭了，就在甲骨文时代已有史书的雏形了。

这样多的历史著作，我们漫无头绪地去学，记了一些年代，记了一些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制度名，人云亦云，有什么用处？史学史或史学概论一类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学历史，要学些什么，学了以后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历史等等问题。史学概论只是重点介绍，重点说明，或发表自己的历史观

点。史学史就不同了，要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要把历史家的历史哲学系统地介绍出来，而且还要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写出来，主要是写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把重点很突出地表彰一下。以前有人说过，考据家、历史家、哲学家三种人的工作地点虽或不同，其实是一个工场中的同伴。所以历史哲学、历史考据学、历史编纂学三者都是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堡垒。比如司马迁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们介绍他的历史哲学时，主要应当说明他怎样描绘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家对人类要负一些什么责任。他写《史记》时，把重点放在哪些地方，而且还要把他的历史编纂学如何配合他的历史哲学，很恰当地加以叙述。又如刘知几也是一个堡垒，他把初唐以前的历史著述作一番综合研究，分析批判，总结出中国历史编纂学如何发展的途径。凡这些，都是学习历史的人所必须知道的。又如中国的书籍，在五代以前，都是手写在竹帛或纸上的。虽然从东汉以来有了《石经》一类石刻，可以由人传拓，但也很少流传。读书一件事，在古代是很困难的。也就影响到历史知识的传播，文化水平因之不易提高。这就出现了另一重点，史籍的刊布流传，对于历史学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史料的储备，有了刻本以后，就方便多了。自从宋代有了刻本史籍以后，事实上对于古代史籍也起了淘汰作用。例如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之能保存下来，其他后汉史之零落散失，除了这些书的本身价值一个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了刻本，书容易保存；没有刻本，便易散佚，其例是不胜枚举的。

什么叫做史料学？有必要再来解释一下。史料者，是“写”历史书籍的资料。其中有实物、有口碑、有传说，有各种文字记载，我们写史书的人不能漫无抉择地乱来运用。并且史料的收集、分类、保管、整理都有一定方法，各国的情况不同。尤其重要的是辨别年代、真伪，作为一个历史家不能不留意。我们祖国既然

有几千年的历史典籍，自然早就有了史料学，不过是不成文的传统而已。古代有所谓“董氏”、“籍氏”，据传说都是管理史料的职官。董，就是董理之董；籍，就是版籍、图籍、典籍的籍。这些人都见于《左传》，如董狐、籍谈都是有名的人物。足见董氏和籍氏都是因世代掌管史料而得的族姓，这就可以说明我国古代保管史料、整理史料的制度开始之早了。并且从甲骨金文里就可以看出：史字从又执中，字形如；尹字呢，从又执丨，字形如，这中就是史册，丨就是刀或笔。而太史、尹氏一类官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经出现。（不过这些还只能说明其渊源。）低的如录事、书记一类，高的如翰林学士、秘书长之流。到了西周早期，太史、尹氏的职掌就很高了。在这里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可以透视出中国古代史料的保管、整理为什么一直出于政府机关的原因就在于此了。中国史料学起源很早，但是写出有关于史料学的著作如《校讎略》、《校讎通义》一类书则相当晚。

现在看来，晚一点也有好处，好在等到西方的史料学进口，作我们的参考，可以更精细地发掘前人的秘密，哪一些可以效法、保存；哪一些可以改良、删除。即就关于气象的记录而言，早在殷代就已经很多。至于天文学上如日月蚀、彗星出现等等记载，也早在春秋初年就有。中国古代历史家保存史料之多，其方面之广如此，这是值得我们后人骄傲的。其最关紧要者，这些史料都是有意识地保存下来的，不是偶然的遗留。在先秦，各国早就有史官的记录，自汉以来，宫廷有起居注，六朝以下，又有实录、日历，宰相有时政记，贵族世系有玉牒，就是平民吧，也有族谱，各地有都邑簿、方志一类著作，历朝科第，有登科录等等。有人说：中国史记载统治阶级的事情多，关于被统治阶级的事情少，这当然是事实。在我国，自古以来，史料的收集、保管、整理、编辑的工作一直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所谓野史，从汉代以来，也一直是有的，不过明清以来更多，内容更丰富而已。

撰述史籍的机关和制度，也始终以政府所办的国史馆、实录馆等为主。宋元以后，各地方从事收集地方史的方志馆、局等机关，也是半官办性质的。其体制和方向，大略与国史相同，总是以人物为主。清代中叶以后，经过章学诚的改良、充实，方志学就成为史料学中的主要部门。方志的数量当然远远地超过于国史和实录。中国的史料学内容如此丰富，实在是大有可为的。史料学和史学史的写法，当然各有不同。史学史是专管过去的史事，作出叙述、分析、批判等工作。史料学就不同了，还要作出创新、提高的工作，其论述方式是以分类述说为主。不过二者关系很密切，写史学史应该分别轻重，说出史料学的发展过程。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也要解决得好。我过去以朝代分，重点三个：①魏晋南北朝；②两宋；③清代。着眼点在史籍种类和数量的增多，历史考据学的萌芽和发展。这样分当然片面性很大。按照现在的一般看法，先秦是一时期，这是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司马迁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现在的话翻译出来就是：“研究出自然规律和人事的复杂关系，讲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写出书来能自成一体。”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见解。而且他开创了纪传体，把以前已经有的编年体二者合起来，作为正史的两大支柱。从司马迁到刘知几可以算为一个时期，这样分法我很同意。刘知几总结了初唐以前的各个历史家和他们著作的优缺点，肯定了许多成绩，使以后的史著趋于一定的形式，尤其是国史，直到清代没有超出他的范围。唐以后所修的官、私正史，《明史》算是写得比较好的，其编订经过我们比较清楚，内容又比较充实、整齐有法。欧阳修的《新唐书》是不能与它相比的。我们也同意从刘知几到《明史》是另一个时代。乾嘉以后，历史考据学大盛；据我看，应该说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件大事。考据学是一种根据逻辑方法考察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学问。我们能够说历史事件不要真实性

吗?当然是要的。自裴松之《三国志注》到司马光《通鉴考异》，有很多地方据事理来推论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这就是早期的历史考据学。到了宋代以后，古器物、古文字、古礼制的研究逐渐合理化。清代学者，更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方面，旁征曲喻，以明郢书燕说之非，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这是澄清历史著作中主观主义的好方法。总之，清代的史学史是别开生面的，虽深透细致可称，而波澜壮阔则不足，那确是事实。问题就在历史家不敢接触到社会实际，鉴于吕留良、戴名世一类人之受到残酷的压迫，是一个重大原因。因之距离发现社会发展规律一义日远，停留于就事论事，不敢深入研究社会的内幕，更无发扬蹈厉的气象可言了。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类伟大著作，就一部也没有了。但这决不能说，历史考据学是与发现社会发展规律一义背道而驰的。恰恰相反，应该说两者是相得益彰的。更恰当地说，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一义服务的。如果认为历史考据学包括了整个历史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按实说来，历史考据学的主要方向是为史料学服务的。就借此机会再来申说一下史料学的内容。什么是史料学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史料收集问题。如《春秋》一类的古代国史，象简单的日记本一样。我们读《春秋》经，如果不靠三传，尤其是《左传》，简直得不到什么史实。这些是中国古代史的史料，其中片言只语，不只是太简单，而且各有各的解释，会引起许多误会，出现大错误都可能。我觉得《春秋》是“断烂朝报”一说还是一点也没有讲错。这种有意识地、又很简单地收罗的史料，古代人就算它是历史著作了。可见史料和历史著作之间的区别，也是相对而言的，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史料学和史学史的关系。古代人所写的纪传体正史，除了《史记》以外，有许多书在今天看来，都变成史料了。写史料学首先要阐明史料一名的意义，其次就

是说史料的收集方法。到了今天，史料收集的方法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复杂，科学性也越来越强。按照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说，其中也有些相当有趣的事。象《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一类大部头的类书，编辑方法各不相同，种类也很多，其最初用意，是为写文章的人储备典故之用的。因为其中引用了许多书籍，日久，原书散佚，反而在类书里保存了许多逸书的一部分或全部。清代学者做了很多、也是很好的辑逸工作。例如邵晋涵辑的《旧五代史》，徐松辑的《宋会要》，都是依赖《永乐大典》为主的。清代以来，从《永乐大典》中校辑或校补出来的即有六、七百种书之多。说这种工作是收集史料的工作也无不可。再次就是史料分类工作。分类的目的是便于利用检查，因此方法也各不相同，同一件史料可以列入不同的目录。目录有各种，如提要，如索引，我们就当它作目录看待。凡是繁重的史著，没有不先做成长编的。长编中的史料有一部分是从目录或索引中搜集而得，经过一番考订之后，才散入长编。有些书，它的名称就叫长编，如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是名副其实的宋金关系史史料长编。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谦称了。编写史学史者，多半很重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部书有总结封建时代政治哲学的功绩，给后来作史者有许多方便；另一个就是写作方法和写作过程都值得我们学习。李焘在《进续通鉴长编表》里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刘恕的儿子刘义仲作《通鉴问疑》，也说：“先人（道原）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李焘的著述乃是续《资治通鉴》之后，其采集史料之法，也被后人所注意。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修史法条说：“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厨十枚，

每厨抽屉匣二十枚，每枚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真可为法也。”这种方法就同我们现在卡片匣子的办法差不多了。

从历代的史官制度中也可以看出古代人收集史料和写作正史的密切关系。唐以前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零散，不易睹其次第。到了宋代，这类资料就多了。北宋以后，关于这类机关，有起居院、日历所、注记案、国史案、编类圣政所、国史实录院、玉牒所等等名目。就在此停彼开、此开彼停一系列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关于史料如何收集、整理以至于写作的经过。凡是这些资料，一方面是史料学，又一方面也是写史学史必须注意的。因为这也是历史编纂学的一部分史实。可以说明我国写作正史的方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这样完备而有条理。

历史学的发展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关联的。我说宋代以后中国历史学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说史学也是受整个社会发展所影响的。考古学的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上文已经提到，也是这个原因。其次就是方志的增多和体制的改良，也是从宋代开始的；现存宋代方志还有十几种，赵万里先生更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六十多种宋元两代的方志。明代以下的就更多了，清代的方志当以千来计算，总数大体已为各种方志目统计出来了。这样多的原因是什么呢？也是因为宋代以后都市发达了，各地方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正如说唱文学、戏曲、小说，也是宋代以后才大量发展起来一样。宋代史官制度、史馆组织之划时代的进步，都是同样原因。又如文件汇编一类书，古代也有的，但宋敏求的《唐大诏令集》，又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分量既多，门类又广。明代以后，便有《经世文编》一类汇编了。这些都是与整个社会发展有关系的。

史学史应该如何写法？重点放在哪里？实在要仔细研究。我的看法，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如果以历史哲学为

主，必然会牺牲掉很多应该讲的东西，并且很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若要在中国史学史里再搬荀卿、王充，就不能搬得太多。如朱熹主编的《通鉴纲目》，里面确实充满了封建正统思想，宋代以后这类书也不少，如果都搬他们的历史哲学，再来一个批评，未免内容太贫乏了。历史哲学的壮阔波澜是可以影响历史编纂学的，《史记》的体制正是与太史公的历史哲学相配合的。可惜司马迁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史学家中并未出现这样伟大的历史哲学。李卓吾的叛逆性格，王船山的雄健识力，都未能逃出封建范畴。《读通鉴论》、《宋论》不必说了，就是《藏书》吧，张角、黄巢还不是照样列在贼臣传。正相反，象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校讎通义》，对于历史编纂学的贡献则是很大的，内容也很丰富，不能不以这些人的史学作重点。我还有一种想法，值得提出来商讨。如刘向、刘歆父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汉书·艺文志》继承了他们父子二人的学问，对于后来的史料目录学有很大影响，讲中国史学史不能不谈一下史料分类方法的渊源。从二刘的七分法到《隋书·经籍志》的四分法，是有一段发展过程的。这在中国学术史的分野上有很大影响，必须讲到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才能显出郑樵《通志·二十略》的伟大性。把古今学术限在经、史、子、集来分，有一部分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不合理。《二十略》能从这种限制中冲出来，还把《七略》的分类法向前推进一步，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是值得一提呢？

最后还要谈一下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我也同意在中国史学史里应该注意到史籍中的一般通俗著作。司马光自己就说过：

“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温公文集》卷六十二，《与刘道原书》）足见司马光以前，也有历史通俗著作，如高峻《小史》之类。此后更多，朱熹《通鉴纲目》以后，不断出现《纲鉴易知